

教育人类学视角下的民族教育史一例

刘诗伯

(大理大学民族文化研究院,671003,大理 中国)

摘要:本文尝试以教育人类学的研究视角和理论方法,分析西方传教士在中国边疆民族地区的办学实践的一个案例,即英国传教士塞缪尔·柏格理(Samuel Pollard,1864—1915)在贵州苗族地区石门坎办学的历史,探讨这些教育实践对我国民族教育从前现代教育阶段向现代教育阶段转变过程中所作的贡献,从中总结其教育思想与理念的历史价值。

关键词:教育人类学、基督教、民族教育、传教士

作者:刘诗伯,法学博士(人类学),大理大学民族文化研究院。地址:云南省大理市大理古城弘圣路2号,671003,大理市,云南省,中国。电话:13128622141。电子邮箱:nature_self@163.com

一、教育人类学的学术关怀

教育人类学是人类学的分支学科,也有学者将其视为为人类学与教育学的交叉学科。它运用人类学的原理和方法去研究人类社会的教育实践活动,通过对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不同历史时期的人类群体的教育活动进行深入考察,探索和总结人类社会的教育规律和特点,其目的是为人类社会实现更理想、更优质、更有效的教育提供科学依据和理论方法。

人类学的一个重要学科特色,就是既认同作为一个生物种群的人类具有广泛的共性,同时也承认并尊重人类不同群体的文化差异性,因此而成为近一个世纪以来学术界、知识界、文化界反对种族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的重要理论依据之一。中国大陆的一位民族地区高校负责人曾总结道:“人类学的理论对多元文化的理解和尊重不无裨益。虽然人类学的不同学派各有短长与不足,但从人类学学科发展的过程来看,对多元文化及其价值的倡导始终是学科的一个重要趋向。”^[1]

具体到人类学在教育领域的应用,我国教育学专家在分析教育人类学诞生的历史及其原因时指出:“教育人类学在西方的崛起,有两个最重要的因素,一是经过文艺复兴运动、新教改革运动和工业革命运动,人的主体性日益确立,人的发展日益重要,教育如何适合新社会发展、培养新型人才、以解决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备受社会的广泛关注;二是多元社会的崛起,需要教育人类学这种具有更综合、更深刻功能的跨学科研究,以全新的视角来研究和审视教育,提供新的教育认识,参与多元化教育

[1] 索端智 SUO Duanzhi,“论多元文化与互相尊重——从人类学的多元文化观谈起 Lun duoyuan wenhua yu huxiang zunzhong; cong renleixue de duoyuan wenhuaguan tanqi”[On Multiculturalism and Mutual Respect], in《青海民族研究》Qinghai minzu yanjiu [Qinghai Journal of Ethnology], No. 7(西宁 Xining, 2003), 49.

实践, 致力于创建本民族特色的现代教育体系。”〔2〕以人类学研究及应用较为普及的美国为例, “人类学家的参与是美国教育人类学学科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关注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的教育问题, 以此捍卫社会公正, 是美国教育人类学研究的重要特色。”〔3〕

对照英国内地会传教士柏格理(Samuel Pollard)在贵州苗族地区石门坎兴教办学的诸多举措和实践, 我们可以看到, 他创办的教育事业正好体现了教育人类学所关注和倡导的多项重要内容。〔4〕

下文将从西方传教士所代表的外来文化如何与中国民族地区的本土文化交汇融合、新教改革和工业革命所产生的现代科学知识体系如何在低生产力水平的农业社会普及与应用、人类学者所说的“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如何更新并最终实现民族地区教育水平的显著提高等几个方面加以讨论。

二、对民族历史及文化传统的尊重

人类学的历史研究发现, 两个或多个异质文化相遇触碰时, 可能出现的局面主要有这样几种类型的状况: 文化张力产生文化冲突、文化采借促成文化整合、文化融合导致文化变迁, 但这些过程却经常与令人遗憾和痛心的紧张、对抗、暴力、征服相伴随。一位美国人类学家在其研究中提出, 历史上的政治强势集团“通常有五种自上而下针对异质性文化的管理模式”, 其中四种分别是“屠杀、同化、区域隔离、整合”, 其导致的后果不言而喻。她认为“现代社会所努力寻求的”较为理想和可行的模式是第五种, 即“实行文化多元主义”。〔5〕

作为一个学科的存在价值的体现, 如何避免历史上的族群对立、撕裂、动乱等悲剧重演, 让社会各群体在不同文化的接触交汇过程中保持开放、和谐, 相互取长补短, 实现共同发展和进步, 一直是文化人类学与教育人类学特别关注的课题。

作为传教士的柏格理清楚知道基督教最早的传教历史, 因为圣经详细记载了初期基督教会处理外族传统文化问题的经过。公元第一世纪当基督教从犹太地区传到亚欧其他区域时, 传教使者即面对如何看待非犹太民族原有的历史文化的问题, 归入基督教的外族信徒应否遵守犹太民族的宗教律法、是否要放弃本民族的文化传统? 这些问题在基督教内部曾一度产生争议, 结果教会通过第一次耶路撒冷会议作出决议, 并向外族的基督徒致函表示: “因为圣灵和我们定意不将别重担放在你们身上, 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 就是禁戒祭偶像的物和血, 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这几件你们若能自己禁戒不犯就好了。”〔6〕这说明, 除了关乎基督教核心教义的几项基本行为准则以外, 非犹太裔的基督徒无需刻意改变自己原有的民族文化和历史传统, 更不必改变自己的民族身份认同。这成为后来基

〔2〕 冯增俊 FENG Zengjun, “论中国教育人类学的学科主题 Lun zhongguo jiaoyu renleixue de xueke zhuti” [On the Subject Theme of Educational Anthropology in China], in《民族教育研究》*Minzu jiaoyu yanjiu* [Journal of Research on Education for Ethnic Minorities], No. 1(北京 Beijing, 2008), 29.

〔3〕 陈学金 CHEN Xuejin, “美国文化人类学与教育的融合及其发展 Meiguowenhua renleixue yu jiaoyu de ronghe jiqi fazhan” [The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Cultural Anthropology and Education], in《贵州民族研究》*Guizhou minzu yanjiu* [Guizhou Ethnic Studies], No. 2(贵阳 Guiyang, 2014), 165.

〔4〕 柏格理 Samuel Pollard、邵慕廉 F. J. Dymond 等, 《在未知的中国》*Zai weizhi de zhongguo* [In Unknown China], 东人达 Dong Renda、东旻 Dong Wen 译(昆明 Kunming, 云南民族出版社 Yunnan minzu chubanshe [Nationalities Publishing House of Yunnan], 2002).

〔5〕 赛诺妮-隆 E. L. CERRONI-LONG, “多元文化教育中的人类学作用”*Duoyuan wenhua jiaoyu zhong de renleixue zuoyong* [The Anthropological Role in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李乔杨 LI Qiaoyang、张培青 ZHANG Peiqing 译, in《民族论坛》*Minzuluntan* [Minzu Tribune], No. 4(北京 Beijing, 2015), 29-33.

〔6〕 新约圣经《使徒行传》*Xinyueshengjing shituxingchuan* [Bible: Acts], 15: 28-29.

督教向各地宣教时遵循的一项重要原则,近代来华的天主教、新教以及东正教大都如此。^[7]

显然,柏格理也将圣经的上述原则应用于他创办的石门坎地区民族教育之中。例如,民族语言是最重要的民族特征,也是传承民族文化最重要的载体,这已是公认的客观事实和基本常识。因此,柏格理为苗族创造苗文,其意义和作用不仅仅是为扫盲和阅读圣经之便,同时也是让苗族文化从口传变成文字记录,从而获得更好的保存并发扬光大。在苗文推广的过程中,柏格理根据本土文化而编写的《苗族原始读本》,包括了苗族的历史传说、歌谣、民间故事,以及本地民众的日常生活等内容。

继柏格理之后,其他传教士和本土知识分子根据不同苗语方言继续完善和编创苗文,他们的苗文创作给整个苗族地区带来了被后来一位语言学家称为“久远而深刻的影响”,被形容为“苗族社会发展进程与我国近代社会历史巨变发生碰撞闪烁出来的火花。”这位专家研究黔东南山区传唱至今的用澳大利亚传教士创造的苗文所编写的福音诗歌,发现“唱经诗中融入了苗族信众自己的生活,本土化、民族化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这不禁让我们感叹,民间的草根文化远比我们想象的顽强,它们以其特有的生命力潜滋漫长,绵延着那一息尚存的文化薪火。”^[8]

除了扫盲教育和创办学校外,传教士在被视为其“主要工作”的传教过程中,也遵从同样的原则。对于希望受洗加入基督教会的应用者,柏格理只提出五项要求:

1. 戒除鸦片;
2. 戒酒、戒赌;
3. 每逢礼拜日停止做生意;
4. 不再畜养奴隶。

5. 所有申请接受洗礼的人必须接受为期六个月的考验,观察其行为是否因信仰而发生根本改变,以此检验他们是否可以真正实践基督教信仰。^[9]

从上述条件可知,传教士关注的主要是道德方面的改善,而不是要改变本地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特性。相反,他们在尽力寻求中国传统文化与基督教信仰可能的契合点。^[10]

三、基督教的科学教育观

在过往讨论石门坎以及其他地区教会学校的教育实践时,国内一些论者基于“科学与宗教必然对立”的习惯观念,强调传教士办学只是作为其传教的辅助手段,认为在华教会学校取得的教育成就,只是“无心插柳”的“意外”间接效果。这样的分析和结论忽略了对基督教教育理念及其历史的深入考察和认识。

首先,从其个人的教育背景可知,出身普通工人家庭的柏格理从小接受英国的公学教育,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17岁即考取政府机关的公务员职位。当时的英国公学实行的是基督教教育,圣经和神

[7] Alexander V. LOMANOV, “Issues of Chinese Culture and Religion in Periodicals of the Russian Ecclesiastical Mission in Peking (1904—1917)”,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ino-Western Studies*, vol. 14 (Helsinki, 2018), 143-161.

[8] 王贵生 WANG Guisheng, “黔东南老苗文的历史及现状的调查和研究 Qiongnan laomiaowen de lishi ji xianzhuang de diaocha he yanjiu”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and Present Situation of Old Miao Language in Southeast Guizhou], in 《凯里学院学报》*Kaili xueyuan xuebao* [Journal of Kaili University], No. 5 (贵州 Guizhou, 2010), 57.

[9] 格里斯特 W. A. SIEGRIST, 《塞缪尔·柏格理——在华传教士的开拓者》*Saimiuer Bogeli: zai hua chuanjiaoshi de kaituoze* [Samuel Pollard, Pioneer Missionary in China], 东人达 Dong renda、东旻 Dong Wen 译, (北京 Beijing, 中国文史出版社 zhongguo wenshi chubanshe [China Culture and History Press], 2018).

[10] 孟广林 MENG Guanglin, “中西文化传统中的‘神(天)’人关系观” [Relations between “God/Heaven” and Man in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al Traditions], in 《国学与西学国际学刊》*Guoxue yu xixue guoji xuek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ino-Western Studies], Vol. 10 (赫尔辛基 Helsinki, 2016), 85-94.

学是必修课, 研读圣经所用的希腊文和拉丁文也是必学的语言, 但学生同时学习天文、地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自然科学, 以及文学、戏剧、历史等人文科学, 还有逻辑学、古典哲学等, 严谨和高质量的公学教育为英国社会培养了大量精英人才, 也使英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文化、教育、科技水平最先进的国家之一。事实上, 基督教教育不等同于人们所知道的神学教育或经院教育, 后者专为培养教会神职人员而设, 前者则是以基督教信仰为办学理念的、面向社会大众的普通教育, 而柏格理本人就是这一教育的受惠者。不难理解, 由于他对基督教教育有切身体会和感受, 自然也认定这种教育不但适合而且可以造福不同地区和不同文化的人群。

细看柏格理时代的英国基督教教育, 我们需要了解和认识的是, 经过近两千年曲折坎坷发展历程的基督教, 在西方社会已经进入到世界历史上科学技术文明和教育水平最高的时期, 而现代科学正是从基督教中孕育诞生的。^[11] 正如清华大学的科学史专家所指出: 基督教的“创世观念、自然定律(自然法)的原则、《圣经》关于统治自然界的命令等等, 都为科学活动提供了关键动机和辩护,” “没有基督教就不可能产生西方近现代科学。” “如果没有基督教和自然神学这个母体, 科学是不可能获得今天这样的权威认知地位的。”^[12]

到了柏格理接受教育的年代, 以英国物理学家、数学家牛顿、莱布尼兹等人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家所奠基的现代科学体系已经发展到相当成熟的阶段, 并且广泛普及到欧洲和北美的基础教育之中。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基础教育仍然属于基督教教育, 是一种植根于基督教信仰、以基督教理念为指导原则的现代普及教育, 它与现代工业文明社会的发展和需求相适应。当时并未出现后来的“宗教与公立教育分离”的情况, 更未到“后现代主义”思潮在西方大行其道的时候。

因此, 作为一直接受基督教教育的传教士柏格理, 其思想意识中并不存在“科学与基督教信仰必然冲突”的观念, 相反, 他相信两者是完全可以而且必须互相结合的。倡导、传授、普及现代科学知识, 消除愚昧和巫术迷信, 既是传播基督教的必然需要, 也是苗族地区从封闭落后的前现代社会迈向现代文明的需要。因此, 在他创办的石门坎教育事业中, 将现代科学作为学习的必要内容, 是理所当然的。这既不是偶然或巧合, 也不是作为权宜之计暂且借用的传教辅助手段。培养有信仰、有现代科学知识技能及文明意识的新一代苗族人才, 本来就是柏格理的办学目标。

基于这样的目标, 柏格理办学所设置的课程体系是以基督教教育理念为原则、以现代科学体系为知识框架、以当地社会实际需求为优先考虑的。这样的设置符合教育发展的自身规律。有研究者将柏格理的课程内容总结为五个方面——以人为本的课程价值取向、扫盲教育与精英教育相结合的课程目标、“自下而上”的课程思路、“农业-科学-教育”相结合的课程实践、以人与社会协调发展为标准的课程评价。^[13]

实践证明, 柏格理推行的这一教育模式, 切实有效地回应了当地民族的真实需求, 因而在短短几

[11] 爱德华·格兰特 Edward GGRANT, 《近代科学在中世纪的基础》*Jindai kexue zai zhongshiji de jichu* [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Science in the Middle Ages Their Religious, Institutional and Intellectual Contexts], 张卜天 Zhang Butian 译(长沙 Changsha,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Hunan kexue jishu chubanshe [Hun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2010); 玛格丽特·奥斯勒 Margaret J. OSLER, 《重构世界: 从中世纪到近代欧洲的自然、上帝与人类认识》*Chonggou shijie: cong zhongshiji dao jindai ouzhou de ziran shangdi yu renlei renshi* [Reconfiguring the World: Nature, God and Human Understanding from the Middle Ages to Early Modern Europe], 张卜天 ZHANG Butian 译(长沙 Changsha,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Hunan kexuejishu chubanshe [Hun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2012).

[12] 张卜天 ZHANG Butian, “‘科学’与‘宗教’概念的演变 *Kexue yu zongjiao gainian de yanbian*” [The Evolvement of the Concepts of Science and Religion], in《自然辩证法通讯》*Ziran bianzhengfa tongxun* [Journal of Dialectics of Nature], No. 3(北京 Beijing, 2017), 152.

[13] 苑青松 YUAN Qingsong, 《柏格理先前教育中课程经验研究》*Bogeli xianqian jiaoyu zhong kecheng jingyan yanjiu* [A Study of Course Experience in Samuel Pollard's Previous Education](贵阳 Guiyang: 贵州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Guizhou Shifandaxue shuoshi lunwen [Master's thesis of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2008).

十年的时间内就大幅度提高了当地民众的文化教育水平,令偏远的石门坎山寨成为举世瞩目的“教育奇迹”之地。^[14]

四、植根本土的教育创举

过去人们习惯性地 将传教士在华兴办的教育称为“西式教育”(与“中式教育”相对),而不是“现代教育”(与“传统教育”相对),因此不少论者更多着眼于其“外来性”,以凸显其来源的地域差异,却忽略了它本身兼具的“国际性”和“本土性”。其实,只要对现代教育在中国(包括民族地区)落地生根、蓬勃发展的历史过程、生长机理以及内在规律进行细致分析和深入研究,就不难想象:若果仅仅是简单地贩运和移植一种水土不服的“文化舶来品”,是不可能 在土壤深厚的中国大地上开花结果的。

正如北京师范大学一位裕固族的教育人类学专家所言:“学校教育 的文化选择研究是教育人类学的核心研究主题,其根本论题是如何看待和处理现代性与多样性的关系问题。”^[15]若以教育人类学的这一视角去考察柏格理实施的 教学方法和设立的课程体系,即可发现:他虽然引进了基督教的现代教育及其学科框架,但他并没有完全照搬西方教会学校的模式。^[16]前述的使用本土语言进行教学、教材编写结合本地文化和生活等做法,其目的何在?实际上,传教士们是在努力探索一种具有现代性的本土教育,这无疑 是苗族教育史上的一项创举。所有考察和研究过石门坎地区学校发展历史的学者,都不会得出这些学校是英国学校而不是本土苗族学校的判断。^[17]

其实,柏格理只是将前辈传教士的首创应用于石门坎地区而已。这种国际化与本土化结合的教育模式,其源头应追溯至新教第一位来华传教士、柏格理的英国同胞马礼逊(Robert Morrison),以及由他所开创的近代华人教育事业。

马礼逊于 1818 年在南洋马六甲创办了面向华人的英华书院(The Anglo-Chinese College),此后数十年间,英华书院一直是新教传教士开办的规模和影响力最大的华人文教机构。该院从办学宗旨、

[14] 东人达 DONG Renda,“近代民族教育的一项创举——滇黔川边石门坎教育体系述评 Jindai minzu jiaoyu de yixiang chuanguju;dianqianchuanbian shimenkan jiaoyu tixi shuping”[An Initiative of Modern Ethnic Education: A Review of Shimenkan Education System on the Border of Yunnan, Guizhou and Sichuan], in《贵州民族研究》Guizhou minzu yanjiu [Guizhou Ethnic Studies], No. 4(贵阳 Guiyang, 2004), 133-140; 何嵩昱 HE Songxu,“石门坎‘教育神话’对当代西部民族地区农村基础教育的启示 Shimenkan jiaoyu shenhua dui dangdai xibu minzu diqu nongcun jichu jiaoyu de qishi”[The Enlightenment of Shimenkan’s “Educational Myth” to the Rural Basic Education in Contemporary Western Ethnic Areas in China], in《教育文化论坛》Jiaoyu wenhua luntan [Tribune of Education Culture], No. 3(北京 Beijing, 2012), 122-127; 李世平 LI Shiping,“试论西方宗教对西南少数民族教育的影响 Shilun xifang zongjiao dui xinan shaoshuminzu jiaoyu de yingxiang”[On the Influence of Western Religion on the Education of Minority in Southwest China], in《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Xinan shi fan daxue xuebao [Journal of Sou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No. 2 (Chengdu: 1995), 42-47.

[15] 巴战龙 BA Zhanlong,“学校教育文化选择研究的根本论题和基本视角 Xuexiao jiaoyu wenhua xuanze yanjiu de genben lunti he jiben shijiao”[Fundamental Theme and Basic Perspective of School Educational Culture Choice Research], in《全球教育展望》Quanqiu jiaoyu zhanwang [Global Education], No. 1(北京 Beijing: 2018), 106.

[16] 陈学金 CHEN Xuejin,“文化多样性与学校教育: 西方国家的实践及中国的历程 Wenhua duoyangxing yu xuexiao jiaoyu: xifang guojia de shijian ji zhongguo de lichen”[Cultural Diversity and School Education: Practices in the West and China], in《广西民族研究》Guangxi minzu yanjiu [Guangxi Ethnic Studies] No. 1(南宁 Nanning, 2018), 99-107.

[17] 张坦 ZHANG Tan,《“窄门”前的石门坎: 基督教文化与川黔边苗族社会》Zhaimenqian de shimenkan: jidujiao wenhua yu chuanqianbian miaozu shehui [Shimenkan in front of Narrow Gate: Christian Culture and Miao Society in Sichuan-Guizhou Border] (昆明 Kunming, 云南教育出版社 Yunnan jiaoyu chubanshe [Yunnan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1992; 贵阳 Guiyang, 贵州大学出版社 Guizhou daxue chubanshe [Guizhou University Press], 2009); 何幼兰 HE Youlan,“从近代石门坎民族教育得到的启示 Cong jindai shimenkan minzu jiaoyu dedao de qishi”[Enlightenment from Modern Shimenkan Ethnic Education], in《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Yunnan minzu daxue xuebao [Journal of Yunnan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No. 2 (昆明 Kunming: 2007), 48-50.

招生条件、师资要求,到教学制度、教学内容及形式等各个方面,为中国的现代教育体系确立了最初的基础。正如中山大学一位近代史研究专家所总结:马礼逊及其助手米怜(William Milne)“将中西方语言、历史文化和科学的交流,与促进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作为书院的两个目标,可以说奠定了近代基督教新教在华开展教育活动的思想。”^[18]此后,包括柏格理在内的传教士们,承继马礼逊开拓之先河,在中国的学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特殊教育、妇女教育、成人教育、民族教育等各个领域着力耕耘,促进了现代教育体系在中国的逐步形成和持续发展。

一位知名的文化历史学家将 1895-1920 年称为我国历史的“转型时期”,是“从传统过渡到现代、承先启后的关键时代。”他提到这个时代转型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国内“新式学校”和“现代教育制度”的兴起,具体表现在“新式学堂的普遍建立,以建立新学制与吸收新知识为主要目的。”以高等教育为例,截至 1949 年全国共有约 110 所大专院校,其中占五分之四的 87 所都是创立于这个“转型时期”,当中的 21 所公私私立大学“几乎包括了二十世纪中国著名的大学及学术思想重镇,”^[19]而这里面又有将近一半是闻名于世的中国教会大学。毋庸置疑,以现代教育为特色的各级新式学校,对中国的社会发展和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今天,我们应该重新认识中国社会发展和教育发展的历史。现代教育虽然是由西方传教士引进、倡导并在中国土地上初创、实施,但它从一开始就是中国教育而不是外国教育,是中国教育从前现代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是中国教育从旧的历史阶段向新的历史阶段的演变和发展。^[20]它可以视为全球教育发展和进步的一个构成部分,但它并不是中国教育和中华文明的异质化,更不意味着中华各族文化将因此而断绝和消亡。

五、立足于差异性发展的人才培养

毫无疑问,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培育人才。而民族地区的教育,当然就是培养本民族的人才。但是,人才的定义究竟是什么?回顾中国历史可知,延续千年的科举制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教育制度与实践,并成为国人文化深层意识的一部分,至今仍有很多人认为教育的最终目的,就是通过层层考试去“选拔优才”。我国有教育专家对此评论道:“科举考试严重脱离社会实际,造成教育与人的发展的背离,教育成了少数人剥夺多数人发展的工具,”它“排斥和扼杀了教育的文化创新功能,”“只是一代代地复制着旧的社会制度,无力对新社会发展挑战做出创新性策应。”^[21]他同时指出,这种教育制度导致人们习惯思维的后果就是:“不重视文化问题的教育研究,把所有的教育都看成一模一样,简单的读

[18] 吴义雄 WU Yixiong,《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地区的早期活动研究》*Zai zongjiao yu shisu zhijian:jidujiao xinjiao chunjiaoshi zai huanan yanhai diqu de zaoqi huodong yanjiu* [Between Religion and Secularity: Early Activities of Protestant Christian Missionaries in the Coastal Areas of South China](广州 Guangzhou:广东教育出版社 Guangdong jiaoyu chubanshe [Guangdong Education Press], 2000), 333.

[19] 张灏 ZHANG Hao,“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 Zhongguo jindai sixianshi de zhuanxing shidai” [The Transitional Era of Modern Chinese Ideological History], in《二十一世纪》双月刊 *Ershiyi shiji* [Twenty-first Century] Bimonthly, (香港 HongKong: April 1999), 29-39.

[20] 沈红 SHEN Hong,《石门坎文化百年兴衰:中国西南一个山村的现代性经历》*Shimenkan wenhua bainian xingshuai: zhongguo xinan yige shancun de xiandaixing jingli* [Modernity Through Grassroots Lens: The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of Ethnic Community in Southwestern China](北京 Beijing, 万卷出版公司 Wanjuan chubanshe [Volumes Publishing Company], 2006).

[21] 冯增俊 FENG Zengjun,“论中国教育人类学的学科主题 Lun zhongguo jiaoyu renleixue de xueke zhuti” [On the Subject Theme of Educational Anthropology in China], in《民族教育研究》*Minzu jiaoyu yanjiu* [Journal of Research on Education for Ethnic Minorities], No. 1 (北京 Beijing: 2008), 33.

书考试,忽视了教育的文化性和差异性。”“偏重分数的教育观使教育难以摆脱小农经济的功名教育体系。”^[22]

具体到石门坎教育的发展,人们谈论其历史成就时通常举出的例子就是:“从这里走出了世界第一个苗族博士。”但是,若仔细分析产生“第一个苗族博士”的石门坎民族教育的具体实践经验,就可发现:虽然柏格理本人就读的英国公学后来逐渐发展成当地少数人的精英教育,但他在石门坎地区推行的并不是我们所熟悉的那种传统精英主义教育以及体现这种教育思维的应试教育,而是适合各个层次和不同人群的、重视人的差异性的现代全人教育(又称素质教育)。

柏格理显然借鉴了英国著名教育家爱德华·思林(Edward Thring)在“厄平汉(Uppinghmn)公学改革”中提出的两条重要教学原则:一是“意识到每位学生,无论聪颖还是愚笨,都必须得到个别关照”;二是“为了有效地关照每位学生,学校必须具备足够的校舍和设施以确保广泛活动的开展。”思林在其主导的公学改革过程中,坚持将基督教信仰教育与对学生的人文关怀相结合,注重学生的个体差异性和学习的自主性,并积极推进体育运动等非考试科目的开展,强调综合素质教育的重要性。他明确提出:“在我们学校里,每个学生都有自己感兴趣的事可做,我们不让任何学生掉队。无论聪明还是笨拙,必须尽最大努力去教育和培训每一个孩子,这是我校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23]这个理念的推行,令他主持的厄平汉公学从一间籍籍无名的乡村学校变成声誉鹊起的英格兰“名校”,许多优秀的毕业生还获得牛津大学的奖学金。我们从“第一代苗族博士”朱焕章的成长经历、产生这位苗族青年才俊的石门坎学校的办学理念、教学管理及其最终取得的成就、以及朱焕章学有所成后拒绝在城市为官而返回家乡从事山村教育的事迹之中,可以看到厄平汉公学改革的影子以及思林教育思想的成果体现。

与此相反,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为国家选拔上层统治精英分子”都是传统精英主义应试教育的最重要特征,其方式是大量重复性的练习和层层加码的考试,而且往往还冠以“注重教学质量”之名,但实际上却是一轮又一轮持久漫长的“淘汰赛”,不断将考试的“失败者”淘汰出局,却不注重学生在非应试方面的其他能力和优势。

十九世纪从托马斯·阿诺德(Thomas Arnold)到爱德华·思林的英国公学改革,恰恰是对他们本国这种传统教育模式的变革乃至颠覆,以适应当时英国社会的变化发展。而受益于这一改革的柏格理,则将他们的教育思想应用到石门坎苗族山村的办学之中。

换言之,“教育产出精英”与“精英主义教育”不是一回事。“第一个苗族博士”在石门坎的出现与成长,只是柏格理推行全人教育的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结果之一,而不是他最初的刻意设计和竭力追求的主要目标。我们在分析这段历史及其成就时不应倒果为因,误以为柏格理实行的是一种精英主义的应试教育,不同之处仅仅是在教学内容上将中国传统的四书五经和八股文改成圣经和新科学知识而已,却忽略了新旧两种教育模式在基本理念和目标上的重要差别。

六、结语

综上所述,以教育人类学视角分析柏格理在石门坎的办学实践,我们可以看到:体现在民族教育领域中的“柏格理教育思想”,除了其忠实虔诚的基督教信仰和令人钦佩的奉献精神之外,至少还包含

[22] 冯增俊 FENG Zengjun、周红莉 Zhou Hongli,“论中国教育人类学的学科意义 Lun zhongguo jiaoyu renleixue de xueke yiyi” [Disciplinary Significance of Educational Anthropology in China], in《当代教育与文化》*Dangdai jiaoyu yu wenhua* [Contemporary Education and Culture], No. 2 (北京 Beijing: 2011), 6.

[23] J. ROACH, *A History of Secondary Education in England 1800—1870*. (UK: Longman, 1986), 252.

了“尊重民族历史文化”、“注重全人教育”、“倡导科学文明”、“国际性与本土化结合”等多个方面。正是这些教育思想和实践塑造了当年石门坎地方的教育形态,造就了西南苗族地区一枝独秀的“教育神话”。

今天,世界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已经进入所谓“后工业社会”,与现代科技日新月异迅猛发展相伴的,是“文化多元主义”旗号之下的“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道德相对主义”“进步主义”“技术主义”等各种充满争议的思潮和理论在西方社会的流行和泛滥。这一系列思潮以及由此而来的各类所谓“政治正确”的主张,深刻影响了西方的当代教育,使之与马礼逊、柏格理等人所处的年代早已不可同日而语。

自明末利玛窦来华后,基督教与近代科学同时传入中国,并在中国的思想学术界和文化教育界内引发了中西文明交汇与碰撞的话题,置身其中的传教士们大都努力尝试“超越差异,探索文化的共通之处”,^[24]但这种尝试并非总能取得理想的效果。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章开沅先生在总结国内过去百多年来的争论时感叹道:“近代以来,我们已经为周而复始的‘体’‘用’之争、西化论与本位论之争耗费了太多的时间。”^[25]跨入新世纪之后,继续重复这类争论确实未必能有效解决眼前的现实问题。“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26]不仅仅是一个口号,而应该是中国教育发展始终坚持的方向。教育是民族复兴的希望所在。回顾柏格理在石门坎办学的历史,那曾经的辉煌里蕴含着丰富的价值和宝藏,足以引发我们的思考和反省,使我们在全球不断变化的形势以及各种教育理念和文化思潮的冲击面前,能够做出审慎而正确的分辨、应对与选择。

[24] 世光 SHI Guang 2016:“超越差异探索文化的共通之处——〈利玛窦:紫禁城里的耶稣会士〉评介 Chaoyue chayi tansuo wenhua de gongtong zhi chu——Li Madou:Zijincheng li de Yesuhui shi” [Beyond Difference:Exploring the Intersection of Cultures. A Review of R. Po-Chia Hsia’s Matteo Ricci: The Jesuits in the Forbidden City], in《国学与西学国际学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ino-Western Studies*, vol. 10 (赫尔辛基 Helsinki:2016), 119-122.

[25] 章开沅 ZHANG Kaiyuan、陈才俊 CHEN Caijun,“价值体系的重建与人类文明的重构 Jiazhi tixi de chongjian yu renlei wenming de chongguo” [Reconstruction of Value System and Reconstruction of Human Civilization], in《南国学术》*Nanguo xueshu* [South China Quarterly], No. 2 (澳门 Macao:2014), 19.

[26] 1983年10月1日邓小平 Deng Xiaoping 为北京景山学校的题词。

English Title:

An Example of Ethnic Education Hist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ducational Anthropology

LIU Shibo

Ph. D. (Anthropology), Professor, Institute of National Culture Research, Dali University. Address: No. 2, Hongsheng Road, Dali Old City, 671003, Dali, Yunnan, China. E-mail: nature_self@163.com

Abstract: Using the perspective and theoretical methods of educational anthropology,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nalyze a case of Western missionary practice of schooling in China's minority areas, namely, the history of Rev. Samuel Pollard (1864-1915), a British missionary, in Shimenkan, Guizhou Province, and to discuss his contribution to ethnic education in its transformation from pre-modern education stage to modern education stage, thereby summarizing the historical value of his educational ideas and concepts.

Key Words: Educational anthropology, Christian, Ethnic education, Missionary